

从唐三彩看大唐盛世气象

刘谦功

提 要 唐三彩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陶瓷产品之一,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唐朝最昌盛时期的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和社会风貌,对其深入探讨,可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唐代具体而微的历史文化现象及其时代精神。

关键词 唐三彩 盛唐气象

唐三彩的名称并未见于唐代及后代的历史文献,人们发现唐三彩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1905—1909年修建陇海铁路时无意中毁坏了洛阳附近的一些唐墓,在墓中发现了一些造型精美、色彩斑斓的陶器,引起了世人的震惊和赞美,因其主要出土于唐墓,又多为绿、黄、褐三色相结合,故称之为唐三彩。“但从有纪年的唐墓考察,早于高宗(650—683)时期的唐墓没有出土三彩陶,这似乎表明三彩陶产生于唐高宗时期,而在玄宗开元朝盛极一时,天宝之后逐渐减少。这就是说,唐三彩从产生到衰落仅有百年(650—755),可谓盛唐之时昙花一现。”^①唐三彩的烧制成功,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唐三彩的兴起、发展和衰退,与唐朝的政治经济相伴随:初唐的创始,盛唐的发展,安史之乱后的衰退,似乎是合着一个节拍进行的。特别是盛唐时期的三彩作品,是那么生动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富裕生活,给人以雍容堂皇的印象。”^②我们知道,唐玄宗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昌隆,军事强大,文艺繁荣,三教并弘,盛唐气象,无与伦比。”^③产生在这一时期的唐三彩,在写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以概括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出品类繁多的形象,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风格,体现出唐代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充分体现了“盛唐气象”蕴涵的丰富文化气息。

考古发掘的唐三彩主要是用作殉葬的“明器”,盛唐之时,“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④从题材来看,唐三彩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即人物俑、动物俑、生活用具和建筑模型。下面我们就人物俑、动物俑、生活用具和建筑模型这四个方面看看唐三彩是如何体现盛唐气象的。

第一,从人物俑看,唐人是雍容华贵、意气风发的。

① 陈进海:《世界陶瓷》第2卷,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2页。

② 杨永善:《中国陶瓷》,台北:淑馨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③ 许明、花建主编:《文化发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④ 《唐会要·葬》卷38,太极元年条。

盛唐时期人物俑的特点是栩栩如生,体态仪容皆丰腴而健硕,充盈着身体的活力与精神的魅力,仔细观之,不同的陶俑又具有独特的姿态、神情与个性,“那自然天成的举手抬足姿态,那动作运行的一瞬,其活泼的生命情态令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领略其高贵辉煌的欢悦和盛大恢弘的精神气象。”^①在唐三彩人物俑中,女俑形象的塑造是最成功、最富有生命力的。面容祥和、体态多姿的三彩女俑有着鲜明的时代风采,多为高髻胖体、袒胸宽衣,展现了“丰肌秀骨”的时代特色。根据古代资料记载,唐代妇女的发型多达一百四十余种,高者盈尺,低者脱垂,或正或斜,若实若虚,不胜枚举,甚至有“双鬟望月”之类复杂而具有文化意义的造型,实属其它时代所罕见,唐三彩女俑把当时妇女千姿百态的发型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唐代女性毫不掩饰、大胆而热烈地表现自己的美,只有真正的盛世才能把纯粹的女性之美置于崇高的地位。

从陶瓷艺术的角度看,唐三彩人物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神形兼备,由于主要是用写实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因此人物表情细腻而传神,“通过这些三彩俑可以反映出唐朝社会各领域、各阶层风俗、服饰的遗迹,及人物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思想情感,他们的体形姿态、衣着打扮、喜怒哀乐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从出土的唐三彩俑来看,它不仅塑制了当时的文臣、武将、贵族等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人物,而且也塑造了仆夫、武士、商人、乐队、仕女等中下阶层的形象。不仅塑造了汉族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而且还塑造了当时在中国生活的欧洲、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物形象。”盛唐首先“盛”在人,仅从当时的都城长安来看,从帝王将相到才子佳人,从贵族阶层到平民百姓,从中国僧人到外国客商……各色人等无所不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朝难得见到的广大士人,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卓尔不群的成就。“旧史学曾艳称所谓‘盛唐气象’。从人,特别是广大士人的精神状态方面来考察,这种积极奋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而在各自选定的领域力攀高峰的风气,倒真可以说是盛唐所特有的气象。判断一个时代是兴盛还是衰弱,固然离不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力状况,人的精神风貌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些看似较虚的因素,其实也是不可忽视的。盛唐之所以为盛唐,除了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军力强大以外,文化人大多情绪高昂、乐观自信,现实为他们提供了最大限度发挥聪明才智的可能,而他们没有辜负时代之赐,确实为国、为民、为己创造出了空前辉煌的业绩。”^②唐三彩中颇有一些文人雅士俑,充分展示出唐人所特有的气韵来。

其次,从动物俑看,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多有寓意深刻之作。

唐三彩的制作手法洗练明快,重在摄取神态,但并未忽略必要的细节刻画,可谓神形兼备。唐墓中出土数量最多的动物俑是三彩马,其造型极其生动而逼真,而且比例准确、线条流畅,甚至可以使人辨认出不少马的品种,如中亚的大宛马、新疆的乌孙马、甘肃的混血马和蒙古马等。马在唐代是力量和速度的象征,代表着强大的威力和奔放的精神,无论是保卫疆土,还是生产劳动,无论是宫廷的典礼,还是贵族的游乐,似乎事无巨细都离不开马。永泰公主墓出土的著名的“唐三彩双马俑”,色彩新鲜悦目,造型逼真动人,一匹昂首向青天在嘶鸣,一匹俯首向大地在觅食。在陶瓷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都造诣颇深的叶喆民老先生说:“看到他们不禁被引进了唐诗的境界。记得杜甫咏马诗里曾有‘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的诗句,特别是那匹状似咆哮的‘嘶风’马俑,

① 徐巍:《从唐三彩陶特点试探唐文化》,《陶瓷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徐巍:《从唐三彩陶特点试探唐文化》,《陶瓷研究》,2003年第2期。

雄姿飒爽,大有杜甫另外一首咏‘骠骠’马时所形容的那种‘哀鸣思战斗,迴立向苍苍’的悲壮苍凉的英雄气概。”^①就是那匹“觅食”马俑在艺术形象上也不逊色,健硕的身体、浓密的鬃毛、可掬的神态充分展示出那一时期马的基本特征和象征意义。

三彩马之外,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三彩骆驼了。由于骆驼既能负重,又耐力极强,故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素有“沙漠之舟”之称。“唐代重新畅通了自汉代开拓的自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穿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各国直到地中海东岸的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商队中的双峰驼也大量来到我国内地。唐墓明器中三彩骆驼有较多出土,又以盛唐时最多,反映了这个时期中西交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目前可见到的盛唐时出土的骆驼,造型新颖多样,有立、有卧,也有正在行走的,有的驮负着货物卧倒在地,有的正作负重欲起的姿态,有的背驮各种装满实物的兽头皮囊,有的带着野鸭、野兽等肉食,以及壶罐等器皿,有的还背驮着丝束和成匹的棉帛,等等,刻画了‘丝绸之路’上商贾骆驼的各种形象。这件唐三彩骆驼雕刻精微,它成为当年丝绸古路上唐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和历史见证。在精雕细刻物象的相对静止状态中,着力表现物象的。”^②唐三彩中胡人牵马与牵驼俑,是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商队的形象再现,杜甫曾写道:“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③在那没有机械化交通工具却有漫漫长路的中古时期,正是这些不畏艰险、不知疲倦的骆驼,架设起中西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桥梁。

第三,从生活器具看,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唐代经济发达,唐人自然特别注重日常生活,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到唐三彩的制造中。“唐三彩生活用具在造型上借鉴了我国唐代金银器、铜器、漆器、藤编器物的式样,特别是与我国邻近的波斯和阿拉伯国家中生活用具的造型特点以及宗教神器中的一些式样。无论是盘碗盅碟还是瓶罐壶钵,都是以浑圆和丰满为主流,端庄而规整,浑厚而饱满,具形杯、鹅鸭形杯一类作品形态奇特、落落大方,更具匠心。鍍和塔形罐类作品收放有致,节奏鲜明。各种小型文房用具水盂、砚台、盆景等小中见大,气度不凡。而双龙耳衔口壶、凤头水柱、狮形杯等奇特新颖的形制则完全是西域风格了。生活用具集结了我国唐代工艺美术中在造型、彩色、光泽等方面所有的优秀传统,在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④这些器皿大多造型浑圆厚实、庄重大气,其油彩更是灿烂夺目、富丽堂皇,反映出当时社会多姿多彩的生活内容,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唐三彩其他类型的器物一样,生活器具同样体现出唐人崇尚完美、大胆追求、兼收并蓄、意气飞扬的时代精神。

唐朝“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⑤在这种大交流大融合中,唐三彩不

① 见叶喆民《中国陶瓷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5页。

② 徐巍:《从唐三彩陶特点试探唐文化》,《陶瓷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杜甫:《寓目》,见《全唐诗》卷225。

④ 徐巍:《从唐三彩陶特点试探唐文化》,《陶瓷研究》,2003年第2期。

⑤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仅借鉴了西亚釉陶的制造工艺,在艺术风格方面也颇有兼收并蓄之处。“以著名的三彩凤头壶为例,它借鉴了波斯国家贵族使用的银器造型,它的主要功用是盛水,而工匠们巧妙地将凤头作成口,凤嘴为流,牵牛花的枝条为柄,外撇的圈足好似半截凤尾,艺术效果极佳。壶的造型直线中有曲线,曲线中有直线,曲线又根据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弧线,使壶体的线条对比强烈,生动而挺拔。”^①器以载道,而“道”正是要我们要潜心去探究的。“‘道’虽可覆载万物,但它同时又深藏于万物之中。……庄子认为任何卑陋的事物中都包含着‘道’,……只有‘道’才是最高最大的美,他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道’存在于万物之中,美在‘道’而不在物。……具有具体形体的物,只不过是‘道’的外化和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②三彩凤头壶这件“中西合璧”的器物对于后人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水壶,它既是美的化身,也是盛唐气象的明证,更是中外技术与艺术交流的典型范例。

第四,从建筑模型看,真实而直观地展示了唐朝的建筑风貌。

唐三彩的建筑模型十分精细,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则天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③的豪华气派。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结构,因此更容易在天灾人祸中被毁坏,因此后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识主要依靠古籍和古画,而唐三彩中的建筑模型却是难得的实物资料,1959年在陕西西安郊区中堡村出土的一组三彩建筑模型就是一个极好的民居建筑实例,该模型是一个长方形的两进院落,由前堂、后寝、廊坊、亭台和园林构成,排列有序,布局合理,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封闭、方正、对称的主要特征,而其园林部分又不失错落有致的“变化”之美,真实地再现了唐朝民居的面貌。

毫无疑问,唐代建筑也是当时大气、自由、开放的时代风格的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唐三彩建筑模型可以和古书中记载的或故古画中描绘的情形相互印证。当时文献所述的贵族宅第,原本只能从敦煌壁画和其他绘画中得到一些旁证,而唐三彩的发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从唐三彩的建筑模型中依稀可见:“贵族宅第的大门有些采用乌头门形式。宅内有在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具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为四合院,但也有房屋位置不完全对称的,可是用回廊组成庭院则仍然一致。……这时期贵族官僚,不仅继承南北朝传统在住宅后部或宅旁掘池造山,建造山池院或较大的园林,还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营建别墅。这些私家园林的布局,虽以山池为主,可是唐朝士大夫阶级中的文人、画家,往往将其思想情调寄托于‘诗情画意’中,同时也影响到造园手法。”^④民居尚且如此,帝王的宫殿就更不用说了,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大明宫、兴庆宫都是当时最宏大、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群。盛唐国力强大,建筑艺术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大多有新的创造,其艺术风貌恢宏朴质,显示出雄深和阔大的气象,体现了封建社会盛期的时代精神。”^⑤这一点在唐三彩建筑模型中也可可见一斑。

① 徐巍:《从唐三彩陶特点试探唐文化》,《陶瓷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杜道明:《从“物中之道”到“味外之旨”——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对象从哲学向艺术的演化》,《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冬之卷。

③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5。

④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117页。

⑤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增订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由此可见,唐三彩继承了秦汉以来陶塑艺术写实的传统,以雄浑大气的造型、绚丽奇幻的釉色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缤纷多彩的众生相,同时又因吸收异域文化而显示出浓郁的异国情调,具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正是这种现实内涵和浪漫风格的融合,使唐三彩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对后来的宋三彩、辽三彩,以及清代的素三彩,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辽三彩,其色彩绚丽的三彩釉饰,颇有唐三彩遗风,并在其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我们从辽三彩中,既能感受到唐三彩的华美,又能体味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雄浑大气。

唐三彩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三彩器,元明时期的琉璃、法华,明清时期的五彩、珐琅彩都与唐三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后来宫殿建筑上使用的琉璃瓦和其他陶制构件,无疑是唐三彩的演化和发展,故宫的辉煌壮丽与唐三彩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另外,唐三彩“随着古代丝绸之路的骆驼队,随着当时远航出海的商船,长途跋涉,飘洋过海,足迹几乎遍布世界,成为我国唐代与国外友好交往的见证。例如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伊朗的拉及斯,朝鲜半岛的庆州,日本的冲绳、北九州、大阪、京都和奈良等地,都有唐三彩的遗存。”^①接受唐三彩对影响最为典型的是日本的奈良三彩,日本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94)仿制唐三彩获得成功,烧造了许多具有唐三彩风格的奈良三彩。追溯其渊源,当为河南巩县窑,在中国该窑最早使用氧化钴,产品出口,且产生了域外的奈良三彩。“如果说中国唐三彩因以黄褐色为主调更显富丽华贵,而日本奈良三彩则以绿色为主调,在繁丽中回归清静从而再一次显示日本人创造性的模仿精神,也渗透出日本人以其内在的纯净之心,驱除罪孽的宗教情怀。无论是心的状态还是物的形态,美与情在形式上趋于一致。”^②除奈良外,大阪、福冈、滋贺等地都有奈良三彩出土,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奈良三彩的烧造和使用还是较普遍的,奈良三彩使日本的陶瓷艺术更加绚烂多彩,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唐三彩的深广影响。

(作者通讯地址:刘谦功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杨永善:《中国陶瓷》,台北:淑馨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② 陈进海:《世界陶瓷》第2卷,第420页。